

方励之的真面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编



法 律 出 版 社

方励之的真面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编



法律出版社

方励之的真面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编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375 印张 70,300 字

1989 年 7 月第一版 1989 年 7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500,001--650,000

ISBN 7-5036-0571-5 / D · 443

定价 1.20 元

0003562

编者的话

为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首都北京发生的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实质，揭露极少数煽动者、策划者、组织者的丑恶嘴脸，我们编辑了《方励之的真面目》一书。本书的内容包括：中央纪委、安徽省纪委一九八七年初有关开除方励之党籍的文件和当时一些报刊发表的揭露、批判他诋毁马克思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丑化人民民主专政，煽动学生闹事的文章；节录了方励之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若干反动言论；收集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缉令和到目前为止，一些报刊刊载的方励之策划、操纵这次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文章。由此可以看出方励之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真面目。

中央纪委办公厅
一九八九年七月六日

目 录

1、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共产党员必须 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	1
2、中央纪委关于旗帜鲜明地同资产阶级自由化 思潮作斗争的通报	4
3、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方励之 党籍的决定	8
4、岂能容忍改变党的颜色	11
5、党的光辉不容抹煞	16
6、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19
7、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23
8、依法办事，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30
9、资产阶级自由化意味着折腾	36
10、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	41
11、决不容许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	46
12、青年知识分子要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52
13、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胜利发展	59
14、谈方励之李淑娴操纵王丹搞动乱	63
15、方励之违背人民意愿	66
16、方先生不再“独立”	69

17、外衣剥光之后	71
18、躲在“洋”伞下的方鼓手	74
19、方励之“彻底”到哪里去了?	76
20、且看方励之的“独立性”	78
21、脱下伪装 露出真面	80
22、方先生为美国献的什么计	82
23、方励之叛国“三部曲”和“三步走”	85
24、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	89
附录：	
方励之的反动言论摘录	90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 遵守党章的通知

中纪发〔1987〕1号

共产党员是否真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充分履行党员的义务，言论行动是否符合党章的规定，这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准。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党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必须清醒地看到，有少数党员，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借改革、开放之机，公开发表违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他们捕风捉影，歪曲事实，蛊惑人心，甚至公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丑化和否定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泛滥开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尽管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只是极少数，但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煽动性、危害性、破坏性甚大，干扰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损害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

0003562

- 1 -

各级党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中发[1987]1号文件通知，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切实抓好。

一、共产党员必须自觉地遵守党章，严格执行党的纪律。遵守党章，特别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对每个共产党员的起码要求。党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每个党员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主张行事，而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党就不可能有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那还有什么希望？所以，维护党规党法，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珍惜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责任。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如果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重大方针和政策问题，党员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经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绝不允许各行其是，公开发表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反的言论，更不允许采取同中央的决定、决议相违背的行动。这是党的政治纪律，是党的纪律中最重要的方面。

二、党的各级组织包括各级纪检部门要切实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担负起维护党章的神圣职责。四项基本原则已庄严载入我国宪法和我们党的章程，是我们立国立党之本，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是我们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它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败。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党组织确实存在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认识不足，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表现软弱涣散的现象，

缺乏应有的战斗力。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坚决同一切违背党章的错误言行进行斗争，是各级党的组织和每个党员义不容辞的职责。不管是谁，其地位有多高，名声有多大，如果违犯党的政治纪律，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对于极少数不顾党组织的一再警告，恣意妄为，严重危害党的人，要坚决清除出党，以保持党的纯洁性。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对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采取宽容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三、要在全党进行党章的再学习、再教育，以增强党性，提高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各级党的组织要认真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党章，严格执行党章的各项规定，并向党员重申党的政治纪律。要通过党的组织生活会的方式，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对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务必教育全体党员一定要严格维护党的纪律，以党章作为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的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自觉做维护安定团结、勇于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作斗争的模范。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三日

中央纪委关于旗帜鲜明地同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斗争的通报

(1987) 第一号

根据党章的规定，中共上海市纪委、安徽省纪委、人民日报社机关纪委先后作出决定，开除了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党籍。中央纪委认为，开除他们三人的党籍，是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保持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所必需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常委集体，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但是，一些部门和地方的党组织和有些党的领导干部，忽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政治思想战线软弱混乱，不少阵地包括某些宣传舆论阵地和某些高等学校讲坛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这些领域相当泛滥。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名为共产党员，却公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大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完全违背了党章和《准则》，严重危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党的纪律绝对不能

允许的。他们被清除出党，完全是咎由自取。各级党组织和纪检机关，要充分利用这三个反面典型，对党员进行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政治纪律的教育。必须看到，对极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作出组织处理并不需要很多时间，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则是长期的，存在于开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被开除出党，我们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

一、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入党。每个共产党员，在入党时都曾庄严宣誓，要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的义务，执行党的决定，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作为入党几十年的老党员，本应该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可是他们放松了自己的思想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在思想上与党离心离德，行动上分道扬镳，完全背叛了入党时的誓言。他们的教训从反面说明，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虽然入了党，但要真正地在思想上入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还需要不断按照党员的标准、条件在实践中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坚定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为之奋斗的信念。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这不是一句挂在口头上的空话，而要身体力行，一点一滴地从我做起。要经得起各种严峻的考验，始终不渝地忠诚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党的纪律。我们党是有严密组织、严格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不是一个可以自

由出入、各行其是、信口开河的清谈馆和俱乐部。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所有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责任。党内不允许有特殊党员，不愿意遵守纪律的党员，害怕铁的纪律的党员，尽可出党。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目无组织纪律，违背党的纲领和党章，我行我素，为所欲为，公开发表言论、文章，反对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而且屡教不改，在党内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是党纪所绝对不允许的，他们受到党纪制裁是理所当然的。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以党的纲领、党章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绳。党员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完全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决议作出以后，虽有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但在行动上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最高标准。

三、各级党组织要切实负起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的职责。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由一个共产党员蜕化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头面人物，绝不是偶然的，除主观原因外，有关的党组织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如果对他们危害党、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言行，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及时进行教育，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和抵制，则他们在错误的泥坑中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的结果，或可避免。即使他们一意孤行，不可挽救，也不至于给党造成恶劣的影响。所以，各级党组织必须在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上，对党员，尤其是对党员领导干部，实行经常的教育、管理和严格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决不能态度暧昧，听之任之，软弱退让。党要管党，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对那些拒绝批评教

育，屡教不改，坚持反对党和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党员，要坚决果断地清除出党。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关于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决定

方励之，男，一九三六年生，一九五五年入党，一九五六年参加工作，原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被撤销副校长职务。

近几年来，方励之在各种场合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煽动学生闹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针对他的错误，党组织曾对他进行过多次批评教育，但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坚持不改，给党造成了严重危害，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事实证明，方励之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其主要错误事实是：

一、鼓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方励之攻击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我们要寻求新的真理”。“我一直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科学”。“所谓的这些指导只会作出错误的结果，从来没有正面的成功”。“对我国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更多的涵义就是领导的指导，实质就是政府的指导，或当权者的指导，或者是党的指导。这更不需要”。

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宣扬“全盘西化”，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诬蔑说：“我们这三十年干的事情，我觉得从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这种结果是失败的”。“现在实际上我们也恨透了三十年这种东西”。“三十年没干多少好事情”。他主张“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他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是“挂个民族主义招牌，民族旗帜下的封建主义，基本上都是独裁制、集权制”。

三、公开提出要“改变党”，否定党的领导。他攻击说：“中国封建统治的一个最大特点，我想是所谓权力的中心和道德的中心是合二为一的。现在共产党就是这样”。“党现在是黑的”，“我也赞成大家入党。入党以后，我刚才说了至少可以改变党的颜色。我正式提出改变党”。他对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写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很不满意”，在公开场合说：“这是非常不对的。这个概念很不清楚，而且一直是作为棒子用的。”

四、主张大学摆脱党的领导，鼓吹大学“完全独立”，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政府的关系。他主张：“大学跟政府的一种关系就是要钱关系”。“你政府要给大学校长钱，其它最好你都不要来干涉”。“大学完全是独立的”。“应独立于政府，成为独立思想的中心”。“在这里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外在的、超越大学之上的一个什么指导者”。他挑拨说：“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觉悟到自己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一个主导的力

量。没有到这一步，还是依附的、封建的。”“如果知识分子不形成独立的力量，中国改革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五、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煽动学生闹事，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在一些高等学校煽动说：“科大学生不够活跃，你们怎么也没点儿‘闹事’的迹象”。鼓吹“学生是民主化的进步力量”，鼓动“学生冲击社会”，说“有些东西是外强中干的，它并没有多少力量，你冲了以后它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捅一捅，影响还是很大的”，“小小地动作动作，全国就非常非常紧张”。他还煽动说，对民主“争取可以有各种方式，……当然也包括一些激烈的方式”。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晚，当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酝酿闹事时，他进一步煽动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第二天，中国科技大学和合肥部分高校学生便上街游行。

综上所述，方励之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他完全背离了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根据党章的规定，决定开除方励之的党籍。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七日

岂能容忍改变党的颜色

邓小平同志早在一九八一年就曾尖锐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

方励之就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之一。一个时期以来，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四处游说，大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恶毒地丑化、攻击我们的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狂妄地宣称“要改造党”，要“改变党的颜色”。

方励之要“改变”我们党的“颜色”，其所谓理由就是我们党“现在是黑的”。他污蔑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从经济、政治各方面，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胡说什么“从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我们做的这种结果，实际上是失败的”，全盘否定了我们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

方励之否定党的领导，妄图“改变”党的“颜色”，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政治主张。在党的指导思想上，他说：“马克思说的仍然是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

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我们要寻求新的真理”，“所谓的这些指导只会作出错误的结果，从来没有正面的成功”。在政治路线上，他提出：“我是欣赏‘全盘西化’的观点的，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在建党方针上，他说：“我们的建党方针是几十年前根据列宁的理论而定的”，必须进行“调整”，即“首先是要发展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他蛊惑人心地煽动青年学生说：“大学生入党就是为了改造党”，“加入（党）就可以改变党的面貌”。在领导体制上，他提出：“如果多党制能够实行，我赞成”，“多派制也可以”。为了实现他的这一套思想体系和政治主张，达到“改变”党的“颜色”的目的，方励之迫不及待地鼓动“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显示自己的力量”，要敢于“动作动作”。并公然煽动青年学生上街闹事，向党施加压力。

方励之的言行足以证明，他已经彻底背叛了我们的党，把自己摆到了与党对立的位置上；也足以证明，小平同志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的功绩和地位是不容否定的。凡是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旧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外忧内患，国弱民贫，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为了拯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各种政治力量都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表演过，英勇悲壮的义和团、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康梁变法、“百日维新”也夭折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但也没有找到真正解

救中国的出路。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才打开了全新的局面。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多时间里，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辉煌业绩更是举世公认的。近百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真正能救国于危难、解民于倒悬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安定团结、蒸蒸日上的崭新局面。我们党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和她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是历史作出的公正的结论，无论方励之等人如何诋毁和攻击，都是无法改变和动摇的。当然，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党也曾有过失误。但每次失误都不是离开党，恰恰是依靠党、依靠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进行纠正、继续前进的，决不象方励之所说从来都是“失败”的，都是“不成功”的。

方励之说我们党是封建专制的党，这更是别有用心的恶毒攻击。我们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彻底地反封建主义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和战斗任务。在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我们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封建的反动统治和土地所有制，取得了彻底的成功。当然，我们还要从思想政治和其他方面，继续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并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并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切实的进展。

目前我们党内还有不正之风、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消

极现象，公开承认这类现象的存在，真诚地欢迎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通过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逐渐完善各项有关制度，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正是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生命力的表现。因此就把我们党说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那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方励之鼓动青年学生向所谓的封建专制的党“捅一捅”、“冲一冲”，这与当年“四人帮”搞的那一套有什么区别呢？人们不曾忘记，当年“四人帮”叫嚷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结果把国民经济闹到了崩溃的边缘。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闹出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难道不清清楚楚了吗？现在我们国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已经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方励之这样的人继续挂着共产党员招牌闹下去，那就只能把现代化闹得精光。

方励之设计的一套“改造党”的模式，不仅完全背离了党纲，背叛了党章，而且完全否定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背弃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其中值得警惕的是他的“建党方针”。

他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同工人阶级的关系，制造知识分子同党、同工人阶级的对立。他利用青年知识分子的幼稚，把他们作为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

我们一贯认为，工人阶级是产生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党必须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只有这样，党才能集合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最优秀、最有觉悟、最守纪律、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先进分子。我们党历来重视从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优秀的工人、农民同样是我们党的发展对象。

但发展党员必须坚持入党条件，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如果按照方励之设计的模式，就会把我们党“改造”成一个没有统一意志、没有统一行动的四分五裂的“多派制”的党，把我们党变成一个不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西化”了的“自由党”、“民主党”。

发人深思的是，方励之今天的反党言行同他过去是一脉相承的。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向党中央上书说，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一九八〇年，他在人才学术讨论会上再次提出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从他的过去到现在，我们看到，建国以来，确有极少数人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我们党离心离德，屡教不改。今天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到党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的长期斗争。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所有逆历史潮流而动者的必然下场。方励之以丑化党、改变党的颜色开始的这场闹剧，终以自己被清除出党而告终。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党，一个久经考验的党，我们拥有四千万党员，受到十亿人民的衷心拥戴。我们完全有信心把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进行到底，完全有信心把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都紧密地团结起来，胜利地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历史使命。

(载 1987 年 1 月 21 日《安徽日报》)

党的光辉不容抹煞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一股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方励之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公开把矛头指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他在一所大学演讲时提出，党“应当变颜色，就应当，因为党现在是黑的。”“我也赞成大家入党，入党以后，我刚才说了至少可以改变党的颜色。我正式提出改变党。”这种狂妄地把矛头指向党的言论，是公然违反党纲、党章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把方励之开除出党，对于维护党的纪律的尊严，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是十分必要的。

方励之提出“改变党的颜色”，实际上是妄图改变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正是这个性质决定了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和巨大作用，决定了我们党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形成移山倒海的力量，向着一个目标奋斗前进，从而也决定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光明前途。如果让方励之等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企图得逞，改变我们党的这个根本性质，否定和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人民还有什么希望？

方励之诬蔑我们党现在是“黑”的，实质上是全盘否定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党在六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逐步发展壮大，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党在人民中间的崇高威望，是在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包括党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中国引上改革开放的大道，这一系列事实，是党的威望的基础。党的丰碑早已树立在十亿人民的心中。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动摇的。方励之提出“改变颜色”，完全违背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违背历史潮流，是根本不着边际的痴想，是根本不可能得逞的。

方励之提出“改变颜色”，实际上也是要否定作为党的理论基础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唯物辩证法在中国被发展成不给出明确答案的，保证自己永远正确的一种辩论方法。……这种‘模型’尽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它最没价值，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统是最含糊、最没价值的东西。”这是想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党从幼年逐步走向成熟，发展到今天，成为有能力领导十亿人民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党的事业所取得的每一步胜利，也正是这种正确结合的成果。这是不容否定也不容改变的。尽管党也曾有过错误，党的事业也因为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破坏而受到严重损失。但是从党本身能够正确地总结历史教

训，清除败类，及时地转移工作重点这些根本方面看，我们的党更加成熟了。党在经历了劫难之后，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党正处于历史发展中最好的阶段。这些事实，是方励之等竭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根本否定不了的。方励之提出要“改变党”，“改变党的颜色”，完全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党的坚决反对。

方励之发表的一系列错误言论，曾经在少数大学生中起了煽动和蛊惑作用，也曾经迷惑过一些幼稚的青年。对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批驳。青年应该从党的历史上，尤其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现实中，进一步认清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识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害，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要坚决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每一个共青团员在这种时刻，更要有清醒的头脑，提高政治警惕，自觉抵制方励之等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原载 1987 年 1 月 20 日《中国青年报》)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红旗》杂志评论员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这种核心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在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 60 多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一个联系广大劳动群众、能领导中国前进的政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才有了希望，才排除万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革命，需要共产党领导；建设，同样需要共产党领导。今天，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才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王若望、方励之等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攻击、诬蔑共产党的言论，已经在一部分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慨。

方励之说，共产党“三十年没干多少好事情”，“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这不仅是我们党的诬蔑，也是对全国人民

的蔑视。建国以来，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建设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方励之等人却不顾这些事实，竭力攻击党的领导，否定 30 多年中国人民所创建的伟大业绩，这显然不是什么认识问题，而是别有用心。30 多年来，我们党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都靠党本身的力量纠正过来了。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决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王若望、方励之等人东奔西走，到处发表讲演，诬蔑党是“黑的”，说共产党的书记“靠整人吃饭”，党领导下的国家“没有民主因素”，是“独裁”、“专制”，其目的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为了取消党的领导，他们鼓吹资产阶级多党制。王若望就直截了当地说：“要害在于党本身要改革”，“要实行多党政治”。其实，资产阶级多党制是资产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表面上看，你上台，我下台，好象很民主，其实质则是资产阶级“一党”的统治，归根到底是为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服务的。王若望、方励之等人的主张，实际上是妄图把我们党从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方励之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改变党的颜色”，要“改造党”吗？他的所谓改造党，就是要按照他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面目来

改造共产党，正如他所表白的，“只有靠我们这些人加入进去，才能改变它的面貌。”有的人鼓吹“党内派别要明朗化、公开化”，搞党内的多派制，破坏党的团结，实际上也是要改变党的性质。我们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任何形式的派性和派别活动”。鼓吹派别公开化，是直接违反《党章》和党的《准则》的。如果党内派别林立，就会使党意志涣散，行动不一，无法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的责任，那不就等于取消了党的领导吗？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十亿人民就失去了一个凝聚的力量，中国就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

王若望、方励之等人诬蔑群众拥护党、热爱党的真挚感情，把群众对党的热爱，讥讽为“象宗教式地那样虔诚地热爱一种东西”。他们力图挑动群众对党的不满，说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没有独立人格”，公然鼓动学生上街闹事。但是，我们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不是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所能破坏得了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个真理已经为历史证明，而且还将得到证明。少数学生闹事已经平息，青年们正在进行反思。他们在认清王若望、方励之等人的言论的本质和意图之后，增强了免疫力，会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王若望、方励之等人对党的领导的攻击，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一些地方、单位畅行无阻，泛滥成灾，重要原因，是那里

党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面前软弱无力。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求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要头脑清醒，态度坚决，在原则是非面前不后退。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定，首先领导要坚定。党的各级领导必须坚定地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支持拥护党的领导的积极分子，给群众指明正确方向，使大多数群众不为别有用心的言论所蛊惑和动摇。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说服、带动群众，为实现党所制定的决议和宏伟目标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有能力领导各族人民胜利前进，创建美好的未来。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使党的领导更加有效和正确，我们党正致力于改善党的领导。我们要继续反对官僚主义，继续纠正不正之风，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改善党的领导的一切措施，已经和正在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坚决支持。任何企图利用我们的改革来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言行，都是全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载一九八七年《红旗》杂志第三期)

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驳方励之鼓吹的“全盘西化”论

本报评论员

中国向何处去？早在“五四”时期到三十年代，就有人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如果说，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是在理论上驳倒这种错误主张，然而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这种错误主张现在已经被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的事实打得粉碎了。但是，正当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向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共同奋进的时候，方励之却乘改革、开放之机，重新弹起“全盘西化”的老调。什么叫“全盘西化”呢？按照方励之自己的解释：“就是全盘的、全方位的开放”，“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研究的。”一句话，就是要在中国不折不扣、彻头彻尾地去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对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是必须予以澄清的。

方励之为了立论有“据”，除了大肆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之外，则不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抹煞我国社会主义的伟

大成就，反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方励之说：“我们这三十年干的事情，我觉得从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这种结果是失败的。”凡是尊重科学，尊重历史的人，是绝不会赞同这个荒谬的结论的。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对立、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基础上的，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它一诞生，就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旗帜，指引着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巴黎公社首先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科学社会主义体系在实践中更加丰富了。从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运动从小到大，逐步发展。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生动地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体系是不可战胜的。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有曲折、有反复，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揭示的社会发展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这一理论体系，奋斗了一生；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为实践和发展这一体系奋斗了一生，他们代表着各自的历史时代，为科学社会主义作出的不朽贡献，是谁也抹煞不了的。我们党也正在为坚持、实践和发展这个社会主义体系而战斗不息。

当然，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封闭的，僵死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因而社会主义体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备，不断发展的。谁也不应把需要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一

种科学体系说成是“失败的”。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方励之如此不顾客观事实攻击社会主义体系，从马克思否定到毛泽东，无非是要釜底抽薪，从“核心问题”突破，从根本上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方励之还说：“……解放以来的这几十年，我们上大学、工作这几十年，所谓的社会主义时期，平心静气地来讲，这个时期同样是失败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九八一年，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的主要成就，列举了十个方面。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也是举世公认的。经过三十多年建设，我们已把一个倍受帝国主义侵略，深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旧中国翻转了过来，我们的经济建设成就、科学技术成就、文化建设成就和国防建设成就，旧中国是无法比拟的，全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卖儿鬻女、饥寒交迫的命运，初步过上了温饱生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人民生活改善是众所周知的，连资本主义国家正直的人们也不否认的。

毋庸讳言，我们三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按理应取得比现在大得多的成就，然而由于历史的曲折，没有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党中央多次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但是，这不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更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主要是我们党的领导工作方面的失误。但这绝不能成为方励之抹煞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

大成就，进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实。何况我们党已经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正领导全国人民在新的起点上前进，社会主义优越性已经日益充分发挥出来了。

不仅如此，方励之还攻击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什么：“原来我们说‘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只有名词。”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在总结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哪一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正因为有了这一正确理论指导，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开拓前进，出现了生动活泼、繁荣昌盛的可喜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八年来，就是在这一正确理论指导下，坚持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上，首先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明确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坚持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各种所有制并存，解决“条条块块”分割，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允许少数人先富裕起来，准许外国人投资在中国办企业，准许中外合资，开放沿海港口，设立经济特区等等，都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政治上，大力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下一步，还将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都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丰富内容。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其内容将更加丰富和充实。怎么能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只有名词”呢？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反对的。”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历史早已作出了结论。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夜，共计七十多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了多次侵略，使旧中国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拯救中华，到处找寻救国方案，曾先后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救国办法，尽管先辈们有气贯长虹、血染中华的英雄气概，但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学生”在“先生”的侵略面前还是败下阵来。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华民族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国成立了共产党，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才把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铁索下解救出来，插上社会主义的旗帜。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早就指出过：“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积贫积弱屡遭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大国，是不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的。翻开当今世界上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迹史，有哪一个过去不是靠对内实行残酷剥削，对外实行侵略和扩张而发展起来的呢？象中国这样一个过去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世界大国，帝国主义是决不会

允许建设一个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同它争夺世界市场，瓜分利益的。如果要取得帝国主义允许，就必须投靠或依附某一个帝国主义大国，那样岂不就要放弃国家主权，牺牲民族利益吗？试看今日的世界，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有哪一个不是或多或少地受制于某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又有哪一个不是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自己国家的主权？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要建设现代化国家，振兴中华，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撇开上述因素不说，中国如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将会使亿万人民重新陷入苦难的深渊。资本主义发展史说明，资本原始积累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的。所以，马克思曾经愤怒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中国要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那就要象西方资本主义那样，从资本原始积累搞起，把现在的公有制财产通通化为某些个人的私人资本，然后再让他们用这种“资本”去剥削广大劳动者。如果那样，我们国家就会发生大倒退、大混乱，甚至会出现新的军阀混战。那样，对全国人民将是空前浩劫，重新失去“人”的尊严，戴上奴隶的枷锁，我们今天的青年一代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将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我们批驳方励之“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是反对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主张再搞什么闭关锁国。《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告诉我们，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的科学

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要进步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坚决摒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因而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但是，我们要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普遍实用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同方励之“全盘西化”的根本分歧之所在。

社会主义旗帜在中国大地上将永远飘扬，这是十亿中国人民的意志，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载 1987 年 1 月 14 日《安徽日报》)

依法办事，处理好民主 与集中的关系

——兼评方励之等关于“民主”的
错误观点

本报评论员

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它是近几年来议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也是被一些人弄得最混乱不堪的问题之一。比如，方励之就鼓吹民主是“以‘我’为主”，多次煞有其事地说，“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上面赐予的东西，不叫民主”，甚至对“发扬民主”的提法也加以否定。他宣传民主的苗头是“谁也不怕谁”，煽动大家要保持和扩大这个“谁也不怕谁”，办法是采取包括激烈的方式在内的各种方式自下而上地争取。他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颇能迷惑一些人，特别是涉世未深的青年人，以致有的错误论点在这次少数大学生搞“大民主”时，竟成了他们的思想基础，或被当作思想武器而广泛使用。

对方励之的上述错误言论应该加以批判，以澄清糊涂的观念。

社会主义民主历来是指“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点在我国

神圣的宪法中写得清清楚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总纲第二条）民主当然不是、也从来没人说过是什么人“恩赐”的，但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而取得的伟大成果。至于说，我们党和国家强调“发扬民主”，指的是要求干部应具有的一种良好的思想和工作作风。这个提法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尽管它不能代替、也没有人想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

除了明确“民主”的真正含义，弄清了“人民当家作主”与“发扬民主”的区别以外，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与所谓“民主、集中就是‘你们讲民主，我一人集中’”的论断相反，在我们的许多重要文件中总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对这个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也不应动摇。

当然，只有基本原则是不够的，还必须使原则体现在能够规范人们行动的行为规则上。这个行为规则，对全体公民来说就是国家的法律。法律既能体现和保障民主，又能体现和维护集中。如果说民主与集中是对立的统一，二者是互相结合的，那么法律就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点和结合部，依法办事就能正确地、恰当地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先从法律的本质来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在社会主义国家，统治阶

级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指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法律作为人民意志的体现，理所当然地要反映和确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因此它也是民主的体现。但法律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行为规则，对全体公民都有约束力，人人都必须遵从，因此，它又是集中的体现。

再从法律的表现形式即法律规范来说。所谓法律规范概括地说就是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或禁止做什么及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的法律条文。法律规范好比一把双刃利剑，它对于法律规定可以做的、应当做的，人们做了，就予以保护；对于法律规定禁止做的，人们做了，就予以制裁。以自由和民主权利为例，与方励之的所谓“近三十年的宣传里我们几乎把所有好的自由、民主、人权（旗帜）都给了（外国）资产阶级”的论断相反，在中国的根本大法宪法——这无疑是一面很大的旗帜——中，除了在总纲内规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以外，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内，又明明白白地写上了中国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有人身自由、通信自由，有进行科学的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有婚姻自由，还有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有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等等。上述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权利，以及其它法律规定的自由和权利，均属于可以做的或应当做的，对此国家的法律予以保护，任何侵犯它们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

制裁。

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和权利，这一点连外国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否认。比如被奉为资产阶级法律典范的法国人权宣言中就明确规定：“自由就是做一切对他人没有害处的事情的权利。”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看待自由呢？马克思在 1844 年的一篇论文中，在引了上述人权宣言的文字以后，指出：“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38 页）我国宪法第 2 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记载了一系列公民所享有的许多自由和权利以后，明确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第 51 条）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只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大问题作出原则的规定，而有关的具体规定或一般制度，则分别由宪法规定享有立法权力的全国人代大会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代大会及其常委会等依法制定基本法、一般法和行政法规。我国的法律体系由宪法、基本法、一般法、全国或地方性行政法规等构成，它们协调一致，都具有法律效力。就拿游行自由来说，宪法上原则规定了公民有游行自由的权利，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规定公民举行游行的具体做法、申报程序以及怎样按宪法规定做到游行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这就要用其它法律形式根据宪法的原则规定而做具体、明确的规定。邓小平同志早在 1980 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就指出过：“为了保

证安定团结，建议国家机关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规定……游行示威事前要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邓小平文选》第330页）。最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从实际需要出发，根据宪法规定制定了关于公民举行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这个《暂行规定》既规定了游行者可以做的、应当做的，也规定了游行者禁止做的。制定这样的《暂行规定》不仅是完全合法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它既保护了公民游行自由的权利，又防范和制止公民滥用这项权利，利用它来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国家的法律一旦颁布施行，任何公民都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犯，“违法必究”。关于举行游行的《暂行规定》也不例外。如果说，在举行游行的《暂行规定》颁布以前，作为一种理由或借口公民上街游行还可以被说成是合乎宪法的行为（当然，我们反对去年年底几个城市少数大学生的那种上街游行，因为游行者的不少口号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他们的游行严重堵塞交通，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侵犯了其他广大市民的自由和权利），那么，在此以后，公民不按宪法和举行游行的《暂行规定》办事，擅自上街游行，那就任何理由也找不出，而是十足的违法乃至犯罪的行为了。

应该明确指出，公民的行为是否违犯已经颁布实施的现行法律，是大不一样的。在尚无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公民的某些行为尽管也给社会带来危害，应该加以反对，然而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还不能予以定罪量刑，或按照类推原则，也只能比照有关法律酌情处理；但是有了法律的明文规定，公民从事违犯法律的行为，就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这时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公民的行为变得不仅仅是某

个具体的危害社会行为，而矛头直接指向国家的法律，指向人民民主专政了。对这种明知故犯、以身试法的行为，如果我们仍然无原则地迁就宽容，不绳之以法，那就无法维护法律的尊严，也无法保证社会的安宁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立法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我国已经颁布了两千多件法律和法规，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还将制定出更多数量和更加细密的各种法律。我们已制定了五年内在公民中普及法律知识的规划，举国上下都在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观念，要法治、不要人治的思想正在深入人心。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日益完善，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现得更加充分，使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处理得更加完好。

(载 1987 年 1 月 22 日《光明日报》)

资产阶级自由化意味着折腾

——方励之是少数学生闹事的挑动者

陆庭植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最易受害的是涉世未深、缺少历史知识和社会实践、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的青年学生。这是今天人们在对少数学生上街闹事进行反思后不难得出的结论。当人们冷静地回顾一下一九八六年末少数学生闹事的起因、经过，深刻分析其思想方面的原因，追溯到个别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一系列蛊惑人心的言论，就不难发现，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之一的方励之，他不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鼓吹者，同时，也是挑起学生闹事的直接煽动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扎实地进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而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则是取得这些成就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仅是广大人民的强烈愿望和要求，而且也是符合广大青年学生的利益的。

但是，方励之出于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目的，极力搅

乱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散布什么“政治上的稳定并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一个活跃的社会并不表示它是不安定的；如果是死气沉沉，反而隐含着什么问题。”他是那样急切地呼唤着动乱的气氛，赤裸裸地鼓动学生闹事说：“我觉得我们科大同学有一个弱点，我和他们很直接了当地说，科大学生不够活跃，你们怎么也没有点儿‘闹事’的迹象。”

方励之期望闹事的契机终于来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晚，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会、研究生会、工会举行基层人民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会上，煽动学生说：“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的”。就这样，方励之把少数学生的情绪推向了极端。十二月五日，由科大部分学生挑头的上街闹事，就在合肥发生了。

这次起于中国科技大学的部分学生闹事，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大，不仅影响全省，而且波及全国其他城市，损害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各界人士和高等学校教师纷纷发表谈话，正面规劝闹事学生珍惜和维护改革和建设的良好环境，指出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大学生的根本利益所在。在这样的形势下，当时身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方励之，居然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科大业余党校结业典礼上继续挑动学生说：面对“压力”，“要沉住气”，“过了一年，也许评价是基本肯定的、是好的事情”，“（你们的功劳）那时别人想拿也拿不走了。”跟着，他又洋洋自得地说了许多热昏的话，什么“科大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可以说我们今天每做一件事情可

能会在历史上写下来”，还说什么他同伦敦、华盛顿通电话，“发生什么事情，就说什么事情，绝不回避，这些人记下来就是历史”；等等，等等。方励之煽动青年学生继续闹事，扩大事态，以对抗中央，对抗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达到了何等利令智昏的地步。

利用青年学生关心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热望，不遗余力地挑动和支持学生闹事，是方励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一，他鼓吹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是多么的美妙，挑动青年学生用“激烈的方式”去争取。方励之一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四日，对北京大学的学生说：“不是完全没有民主，关键是要靠你去争取”。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对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们说：“对于民主的理解关键是要承认每个人自己的权利，用一个国家比较敏感的词说就是‘人权’”，“民主”、“人权”“要靠我们去争取，才能真正得到。”“争取可以有各种方式”，“当然也包括激烈的方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方励之就是要用“激烈的方式”，即闹事一类行动，去争取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自由”和“人权”的。

第二，假关心改革之名，蛊惑青年学生“动作动作”，“捅一捅”党和政府。方励之煽动说：“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最大的问题，实际没有解决好。如果再不解决，改革成功的希望可能成为泡影或走向歧路”。当有些青年学生问他在改革中能做点什么时，他迫不及待地说：“中央非常重视大家的动作”，“如果哪个地方的一个大学闹事了”，那么那个“省委就别干什么事了，完全围着学生转了”，“我想这个意思是非常明显，我们学生的作用还是很大的”。他在另一个大学里又

说：“只要捅一捅，影响还是很大的。大家做为学生对去年（指八五年）下半年以来印象深刻，小小地动作动作，全国就非常非常紧张”。说得多么露骨，气焰何等嚣张。方励之要“捅一捅”，“动作动作”，其矛头是直指我们党的。

第三，利用青年学生的热情和幼稚，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煽动搞“大民主”。他散布说：“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他把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比作“东西”，狂妄地说，“有些东西是外强中干的，它并没有多大力量”，进而煽动“中国知识分子要显示显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自己已经有的力量，但是没有意识到或是没有敢于显示出来”，“只是你敢不敢用”。方励之所鼓吹的这种“不怕”、“敢于”，与当年“文革”中猖獗一时的“造反”精神有何不同呢？

总之，方励之在挑动学生闹事上，是用尽了心机，费尽了口舌，来往奔波，四处挑拨，多方策动，不遗余力。仅据去年十一月中旬五天的统计，就先后到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同济大学、宁波大学发表了多场演讲，鼓动学生向党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有时连学者、教授身份也不顾，在讲坛上挥拳舞臂、忘情呼叫，竭尽挑拨、煽动之能事。当学生未闹事时，他着急地说“怎么也没点闹事的迹象”呢？还不止一次地说：“真正闹起了事，校长也管不了”，“如果闹事可以解决，也可以闹事”。当学生在他挑动下闹起了事，他兴高采烈地大加赞许：“我觉得这种闹事表明了学生对社会的敏感，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学生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年轻人第一次起了带头的作用”，“在历史上会写上一笔”。

方励之如此热衷于挑拨青年学生闹事，说到底，就是妄

图使用“大民主”的手段，向党中央施加压力，迫使我们党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改变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离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但是，他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党的政策是得人心的，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开放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在当今中国，不存在着闹“大民主”、搞动乱的思想和社会基础。那些上当闹事的青年学生多数人在看清了方励之等人的面目以后，很快地唾弃了他们。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少数青年学生闹事，帮助我们认清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和危害，认清了方励之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的用心。

我们还可以说，正是少数学生闹事，使人们清醒地看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总是和折腾联系在一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就是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局面，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顺利进行的一场严峻斗争。

我们还相信，参加上街闹事的少数青年学生，是会自觉地吸取经验教训，认清资产阶级自由化确实是一种毒害青年、危害社会进步的思潮，认清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方励之的真实面孔，在学习和实践中，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脚踏实地地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来。

(载 1987 年 1 月 22 日《安徽日报》)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与方励之在中国知识分子使命
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或者说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是方励之在公开场合谈论最多，也是颇能迷惑一些人的题目。

诚然，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当前改革的形势，为在本世纪末把祖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清醒地认清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激发献身四化，振兴中华的热情，这是值得称道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就有优良的传统。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优秀的知识分子总是以天下为己任，把自己的使命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论是抗日战争中投身于全民族神圣抗战的洪流，还是在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艰苦岁月；不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还是在反对“四人帮”的疾风暴雨中，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都和全国人民一道，作出了正确的历史抉择。

不过，方励之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在许多公开场合的谈话中，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全盘抹煞我国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把社会主义说

得一无是处，散布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言论。从这个命题出发，他把中国知识分子当今的历史使命归结到一点，就是“全盘西化”，“它的实质精神就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的东西。”为此，他鼓动知识分子要有背离社会主义的“独立的意识和价值标准”，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独立的社会力量”。他公开宣称，知识分子要入党，因为“入党以后可以改变党的颜色”。“我正式提出改造党”。

显然，围绕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我国广大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励之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实际上，中国要搞现代化，究竟是“全盘西化”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已为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他们力图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中国的真理，正象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相反，“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当时，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忧国忧民之士，也曾幻想用“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药方，疗治中国的痼疾，同样也在现实中碰壁。历史结论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经验，其中也包含着广大知识分子在黑暗中摸索得出的信念。许多曾经在国外生活过、工作过的知识分子指出，当年他们抛弃优裕的

物质条件，毅然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到新中国，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是他们从鲜明的历史对比中，从亲身的经历中看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和个人的前途。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的理想和追求，离不开社会主义道路。

其实，只要不抱有偏见，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为中国知识分子发挥创造才能提供了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的良好条件。正是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的历史使命，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社会主义的确立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一方面，我国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打破了帝国主义核垄断；航天技术、遗传工程、电子计算机、核能利用以及许多过去是空白的科学技术，我们不但建立起来，而且取得了世界一流的成果。另一方面，我国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就连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也不能不承认。尽管我国在经济、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不是一个早上能够消除殆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所在。但是，如果我们按照方励之所说的搞“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必将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将会重新陷入混乱、分裂、黑暗和倒退，这是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同意的。

当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有过错误和严重的教训。特别是“四人帮”横行时，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也正是知识分子遭到浩劫之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花了很大力气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落实政策，使科学的春天，文艺的春天又重回大地。我国知识分子比任何时候都心情舒畅，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很好发挥，他们的政治地位、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比较大的改善。这方面的工作今后还要继续坚持做下去。这也恰恰说明，克服现实生活中各种轻视知识和不重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最根本的还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离开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离不开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时代赋予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这是已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识的真理。我们反对“全盘西化”，反对不分精华糟粕全盘照搬资本主义，但是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我们不仅要学习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要学习他们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派出并且还将继续派出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大批专家学者出国考察，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在这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负有特别重要的使命。如何从世界各国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汲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验，有分析有鉴别地拿来为我所用，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步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发挥出来，这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使命。广大

爱国的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决不会辜负我们民族的期望。

(载 1987 年 1 月 23 日《光明日报》)

决不容许挑拨知识分子 同党的关系

本报评论员

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头面人物方励之，四处游说，极力丑化我们党，丑化我国知识分子，挑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妄图煽动知识分子摆脱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坚决反对。

为了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方励之在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问题上大做文章。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动物式”的“驯服工具”，知识分子“必须把屈着的腰挺起来”。这不仅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肆意歪曲，也是对知识分子的污蔑。

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们党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进一步强调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推倒了“两个估计”，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与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社会力量。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党一再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收了大量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进一步改善了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党还努力为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和工作、生活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创造条件，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证明，这八年，是知识分子地位显著提高的八年，是知识分子心情舒畅的八年，是知识分子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的八年。党的政策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在各条战线上以主人翁精神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丰富经验和广博学识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继续埋头苦干。中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的中坚力量。青年知识分子生气蓬勃地活跃在四化建设的岗位上。许多知识分子在艰苦条件下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地工作，把自己的青春和才干奉献给社会主义事业，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我们的知识分子无愧于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光荣地位，是党的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有过失误。在彻底纠正这些失误的今天，也还有许多工作不尽如人意。我们真诚地欢迎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批评。但是，象方励之这样，污蔑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广大知识分子是“动物式的人”，恶意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我们的知识分子不答应，我们的人民也不答应。

还必须指出，方励之说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涵义是根本不同的。方励之说的是哪种什么样的地位？他直言不讳地说，知识分子是“独立的力量”，“主导的力量”，“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领导地位”。蓄意

制造知识分子同党、同工人阶级、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煽动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实现他的政治野心的工具，这才是方励之的真正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知识分子正因为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也才成为国家领导阶级的一部分，方励之的言论和行动，已经走到公然蔑视《宪法》、践踏《党章》的地步了。

方励之特别热衷于挑拨青年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他说：“雷锋的观念是陈腐的，是‘工具论’最典型的体现”，“理想太少，自我打算太多，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希望所在，因为它说明了这一代人具有独立意识”，热爱党“有盲目性”，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当代我国青年知识分子有着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这是非常可贵的。历史和现实证明，这种愿望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列宁指出：“我们是跟旧的腐朽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的”，党爱护青年，青年热爱党，这是历史的必然，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正确方向，就是要善于把远大理想同现实的奋斗目标紧紧地结合起来，发扬雷锋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创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发进取；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在党的关怀和指引下，我国各条战线涌现出大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保卫祖国，为四化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才是当代青年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之所以在。方励之把青年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热爱党的感情说成是“盲目的”，把自觉服从于党的事业的行动说成是当“工具”，鼓动青年放弃远大理想，追求“独立意识”和“自我打算”，这不明明是在煽动青年知识分子与党对立，把他们引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歧途吗？

方励之不仅挑拨青年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同党对立，更为严重的是公然煽动大学生在行动上与党对抗。鼓动他们要“争”，要“捅”，要“冲”，要“闹”。他说：“学生是民主化的进步力量”，要“冲击社会”，“只要捅一捅，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迫不及待地说：“科大学生不够活跃，你们怎么也没点儿‘闹事’的迹象”。去年十二月四日晚，当科大部分学生酝酿闹事时，他进一步煽动说：“民主不是从上而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这简直是唯恐天下不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任务，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经济管理民主化的任务，提出了在全民中进行民主法制教育的任务。正当党领导全国人民有秩序、有步骤地向高度民主的目标前进的时候，方励之却宣扬资本主义民主，煽动青年知识分子离开党的领导，成为独立的“民主化的进步力量”，搞“大民主”。这岂不明白是干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破坏安定团结，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吗？事实证明，离开党的领导搞“大民主”，只能是“文化大革命”中“踢开党委去闹”那一套的重演，只会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是广大群众所绝对不能允许的，也是广大青年学生所坚决反对的。

问题十分明显，方励之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的要害

就是要否定党的领导。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同方励之所鼓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实质就是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的领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中国就必然要倒退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也就谈不上有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光明前途。方励之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违背历史潮流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也是为广大知识分子所坚决唾弃的。

方励之自视为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其实，他根本不能代表我国的知识分子，而只能代表极少数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应该看到，青年学生的主流是好的。即使是参与和被卷入这次闹事的学生，也还是关心改革、热爱祖国、愿为振兴中华出力的，尽管采用的办法不妥，但是一旦明白事情真相，就一定会断然抛弃方励之所鼓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他们将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健康地成长起来。要把他们同极少数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极少数坏人区别开来。我们批判方励之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的错误言论，以澄清是非，不仅不会影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落实，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坚持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更加充分地发挥我国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即使对方励之这样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我们还是要安排适当的工

作，发挥他们的专长。在他们切实改正错误之后，要欢迎他们的进步，政治上仍然予以信任。今天，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正在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和高度的事业心，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同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密切地联系起来，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密切联系起来，朝气蓬勃地建设我们灿烂的新生活，为两个文明建设不断地做出新的贡献。别有用心的挑拨者、蛊惑者、煽动者妄图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枉费心机的！

(载 1987 年 1 月 23 日《安徽日报》)

青年知识分子要紧密团结 在党的周围

——驳挑拨者方励之

本报评论员

一个时期以来，方励之利用到一些大学讲演的机会，散布了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他利用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比较幼稚的弱点，鼓吹所谓“独立意识”，挑拨党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关系，企图把青年知识分子引上摆脱党的领导的邪路；他甚至假“民主”之名，公开煽动大学生“闹一闹”，向党示威。这些错误言论，严重毒害了一些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因此，批判方励之在这方面散布的种种谬论，对于帮助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明辨是非，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是十分必要的。

(一)

在谈到我国知识分子地位时，方励之说：“在中国，知识分子和知识完全是为统治服务的，是一种隶属状态，科学只是一种工具。”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就会发现，方励之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所致力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首先表现在，全党在理论上大力批判了“文革”中一系列蔑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方针。早在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他郑重地告诫全党：“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此后不久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了上述主题，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著名论断。邓小平同志批评了那种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异己力量的错误思想，指出：“从政治立场这个基本方面来看，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应该说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明确的，党对知识分子是信任、尊重、爱护的，并努力创造条件，使他们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党尽了最大的努力。党和政府在经济条件尚不宽裕的情况下，大力发展教育。这两年新建的高等院校，甚至超过“文革”前十七年的总和。为了鼓励人才脱颖而出，国家设立多种多样的奖励制度，对那些在四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使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党中央还提出了领导干部“四化”的原则，大批富有革命朝气、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走上了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岗位。

位。只要不抱偏见，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不能不由衷地说，这几年是知识分子心情最舒畅、工作最有作为的时期。所谓知识分子“是一种隶属状态”、“是一种工具”云云，不过是方励之的蓄意挑拨而已。

(二)

青年包括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沿着党指出的方向前进，才能茁壮成长并建功立业。这是“五四”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但是，方励之却鼓吹什么青年知识分子要摆脱所谓“依附性”。他认为，“过去，对整个年轻一代的培养，在人的修养方面，是以雷锋作榜样。他的人品、道德当然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但雷锋的‘螺丝钉’观是不对的。”“雷锋的观念是陈腐的，是‘工具论’最典型的体现，”因此，他主张青年知识分子要有一种同党的思想不同的“知识分子意识”。方励之还说，五十年代培养的大学生，“好的方面是理想主义比较强，但是很差的方面就是驯服工具、非常差，这个驯服工具也是在党、在马列主义一套标志之下的。还是封建的一套，就是依附，没有独立人格，缺乏独立。”他主张现在的大学生要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感觉，也就是独立的意识”。

又是“知识分子意识”，又是“独立意识”，方励之说得很动听，但是剥去这些诱人词藻的外衣，我们不难洞见它的实质，就是煽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摆脱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的指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一再重申“双百方针”，从来没有谁说过知识分子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相反，党一贯强调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创造精神。当然，我

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都由衷地感到，马克思主义、四项基本原则，不仅不会妨碍我们进行独立思考、发挥创造精神，恰恰是为我们的独立思考、创造活动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方励之大讲的所谓“独立意识”、“独立人格”，同我们所说的独立思考、发挥创造精神毫无共同之处，他的用意在于诱惑青年知识分子“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外，跟着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跑。

至于方励之对雷锋的指责和贬斥，更是十分荒谬的。稍微上一点年纪的同志都会记得，雷锋的事迹，雷锋的精神，何等强烈地感染过自己，激励过自己。周恩来同志曾对雷锋精神作过精辟的概括：“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雷锋同志在短暂的一生中，始终以一个有血有肉的战士的自觉行动实践着自己的理想。方励之诬蔑雷锋是什么“工具”，说到底是因为雷锋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比忠诚。这一点恰恰是广大青年包括青年知识分子应当学习的，恰恰代表了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方向。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是中国青年经过无数实践所选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青年要想成为一个品德高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就应当象雷锋同志那样，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壮丽事业。一个人如果总是想着自己，自我膨胀，置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于不顾，那是不会有什作为的。因为一个人的价值究竟如何，归根到底要看他是不是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为人民的事业干了多少实事，作了多少

贡献。

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好传统的。无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大学生，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从总体上看，都是爱国的，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个知识分子队伍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合作、共同奋斗，是我们的事业顺利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而方励之一方面把五十年代成长的知识分子说得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又别有用心地宣扬，“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在八十年代形成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有意挑拨的语言对于那些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缺乏丰富的社会经验、缺乏全面的自我估计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会有诱惑力的。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专门用漂亮的言词来奉承我们的人，往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天真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对方励之这样“捧”我们的人，难道不该提高警惕吗？

同老一代的知识分子相比，青年知识分子固然有自己的长处，但也有很明显的弱点。他们渴望有新的创造、新的建树，这种愿望也是积极的、合理的。青年知识分子要在发扬自己的优点的同时，努力向老一辈学习，不仅学习他们长期积累的丰富知识，而且学习他们为事业、为理想矢志奋斗、勇于献身的高尚精神，严谨求实、永不满足的优良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在老一辈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作出新的贡献。总之，青年知识分子和老一代知识分子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共同的纪律。我们相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一定能象老一代优秀知识分子那样，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奋斗。

(三)

方励之利用青年学生关心改革的良好愿望，煽动他们闹事，使一些学生上当受骗。对此必须予以揭露。

方励之说，“现在很多人说中国要改革，成功与否看上面决心……但我觉得完全依靠上面这种决心，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不仅纠正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持续十年的错误，而且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拉开了中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新长征的序幕。正是党大力推进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正是党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这八年中，党始终卓有成效地领导全国人民革故鼎新，励精图治，使国家的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方励之不顾这些事实，硬说改革“靠上面”即靠党的领导不行，目的仍然是企图把青年学生引导到摆脱党的领导的邪路上去。

事实也正是如此。方励之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到处鼓动学生“冲击社会”。他说：“只要捅一捅，影响还是很大的”，“小小动作，全国就非常紧张！这说明有力量，只是你敢不敢用”。而一些天真幼稚的青年学生，在受到方励之的蛊惑、煽动之后，也确实误以为闹一闹，就可以促进改革，因而采取了上街游行等错误行动。闹事的结果如何？结果是严重影响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干扰了党中央的部署，给改革增加了困难。这无论对参与闹事的青年学生，还是对广大青年来说，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牢记这个教训，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坚决

的斗争。

历史已经证明，搞革命，离不开党的领导；搞现代化建设，也离不开党的领导；青年的健康成长，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我们希望，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载 1987 年 1 月 28 日《中国青年报》）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 不断胜利发展

——驳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本报评论员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党章总纲中明文规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再次明确指出：“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然而方励之竟置党纲党章于不顾，公开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妄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九八〇年，方励之在全国人才学会议上就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一九八五年三月，他又在浙江大学说“中国当前的问题不能依靠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批评过这种“过时”论后，方励之毫无悔改之意。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他在我省某出版社座谈会的发言中说：“有人讲我是向马克思主义进攻。对，我不仅要进攻，还要讲究策略，采用迂回的办法进攻。”

方励之“进攻”马克思主义，的确是讲究策略的，其主要

手段有：（一）先歪曲，后否定。例如，他先将唯物辩证法歪曲为“不给出明确答案以保证自己永远正确的一种辩论方法”，然后宣称“我们不赞成这种方法”；先将马克思讲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曲解为“空想社会主义”，然后断定它不能实现，提出要用“民主社会”来代替它。（二）极力散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失败”了。他说：“我们这三十年干的事情，我觉得从社会主义体系看，是失败的。……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这种结果是失败的。”（三）竭力贬低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他反复说：“在百家研究范围里马克思主义至多只能是一家，没有居于一切之上的指导地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特征是不断的成功，而绝不是一直失败。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后，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播和发展，其影响所及，已遍布世界每个角落，而且在世界的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内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活的面貌，开创了并正在开辟着人类历史的新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和危机日益加深，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民向往着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也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经过了长时期的摸索，才找到马列主义这一最好的真理。正是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使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建国后，党领导全

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有了新的、举世瞩目的进步。这些不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吗！？综观世界和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具有伟大的生命力。

毋庸讳言，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有过失误。然而，这些失误无一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实践恰好说明：只有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革命和建设才能获得成功；而一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革命和建设必定会失败。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伟大的生命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严整的科学的世界观，它是在历史和科学的前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不仅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各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虽有千差万别，然而，它们都逃不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的运动规律。我们国家过去要消灭剥削和压迫，现在要消灭贫穷和愚昧，建立起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必须走历史的必由之路，因而都必须坚持以揭示出历史必由之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种指导作用是任何其它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无法取代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全部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进行，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并没有完

成，而且，它还会在指导世界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必须指出，方励之往往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同运用这种世界观、方法论来分析具体事件所得出的结论混为一谈，企图以马、恩、列、斯等人所得出的某些结论、论断的过时来证明他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对的。实际上这也是徒劳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运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当然，对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可能会出现失误，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一些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也会因这些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而过时，但是，我们决不能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同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混为一谈，更不能由此就得出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过时的错误结论。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是错误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的教条来裁判生活，当然也是错误的。我们在坚决批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同时，一定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新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突破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与结论，马克思主义才能随着生活前进并指导生活前进。

(载 1987 年 2 月 8 日《安徽日报》)

北大一学生
谈方励之李淑娴操纵
王丹搞动乱

北京日报编辑部：

我是一名大学生，昨天在电视中看了在崇文门被害烈士崔国政情况的报道，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回想近两个月来的事情，内心无限的愧疚。中国的群众太善良，中国的军人太善良，中国的绝大多数学生也太善良。为了不让善良的人们再做无谓的牺牲，经过痛苦的抉择，我决心将王丹的情况告诉你们，让大家别再“善良”下去了。

我原本不认识王丹，只听说他学习成绩很差，从国政系蹲班一年到了历史系。但他很有来头，每周三下午在校内“塞万提斯”像下办民主沙龙，已经坚持一年有余了，每期由方励之、李淑娴出题目，主要是介绍方励之等的观点，还请过美国大使洛德夫妇来演讲。小有名气。因此，很想结识他。可惜一直没有机会。4月18日凌晨，我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请愿时，才第一次和他直接接触。当时，我们从北大走到天安门，已经很累了，又在大会堂前坐了很长时间，队伍只有一百多人了，很想回校。他出面和另一个人劝大家坚

持并两次出去打电话，回来后向大家传达李淑娴的意见。记得一次他说，传达李淑娴老师两点指示：一要坚持，现在李老师已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大字报号召声援，北大队伍马上就到。二是要求人大负责人接请愿书，通过合法手段实现目的。当时对他的印象挺好，挺勇敢。随后，我就跟他接近起来。

随着和王丹的接近，逐步发现他并不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好。如：4月20日凌晨，我们冲击新华门时，他鼓励我们应该勇敢，可是警察一来他就跑了。当时，新华门前并没有人被打，可他偏让说是“血案”。说北师大郭向东是被警车轧死的。我告诉他，我亲眼所见没有血案，再说连郭向东的男朋友都证明是105路电车轧的，为什么还说谎呢？他说，这是动员群众的需要。他还说“你太傻冒了。”“为什么我们提为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时，李淑娴老师让把知识分子改为公民呢？这是斗争艺术。”4月26日，我们都已被人民日报社论惊呆了，王丹又急急忙忙从李淑娴老师那儿回来说，我们要改变斗争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他急急忙忙参加会，会上订下了改变口号的决定。5月4日游行回校后，很多同学想复课了，王丹坚决不同意。他提出要于5月13日绝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时候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我心里对此很不满意。为什么要用洋人压国人呢？这样做是爱国吗？5月13日绝食开始后，社会各界都很同情学生。但我发现5月15日下午王丹陪一个领导来到广场时仍然十分精神。大声讲话，一点不疲倦。后来才听说他虽然在绝食声明上签了字，但因斗争需要还不断进餐，晚上也另有地方住宿。王丹

的保镖说是在蓟门饭店包了单间。经我后来打听，此事确实。

随着事态的发展，王丹的地位逐步提高。我要见他十分不易。只有一次，难得的机会深谈了一阵。我问他怎么收场。他说不怕，只要闹到像方励之老师那样大的名气，他们就不敢动了。我问他最终目的是什么？他说最低目标让他们承认“高自联”合法，给方励之平反，民间办报。最高目标是建立“多元政体”，实现“精英政治”。我问官倒还反不反？他说那是小事。随后就坐着包租的小汽车走了。

6月3日凌晨，部队还没来，王丹见势不好与另外三个人先从天安门广场溜了。他给了保镖每人一千元，然后乘一辆黑色牌照的轿车跑了。有同学看见他随身带了一个提包，装着数万元钱。

当然，虽然王丹算是个风云人物，但我还是觉得他只是个小角色。每次发言都是事先准备的。没准备时就显得语无伦次了。虽然他在香格里拉饭店专门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声明与方励之、李淑娴没关系，但我看还是关系很密切。也许是有人利用他，也许是他利用了别人，都很难说。但在近两个月的事件中绝不是像人们想的那么简单。不幸的是，善良的人们总是把十分复杂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但愿善良的人们能从王丹的真面目中得到点启示。

请原谅由于环境的不允许，我暂不署名。

89.6.14

(载 1989 年 6 月 16 日《北京日报》)

方励之违背人民意愿

——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的信

我是一位中年知识分子，曾经在大学里任过教，现在科研机关做研究工作。我也曾是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现在我想谈谈方励之，并对青年学生讲几句话。

这次反革命暴乱，方励之是主要煽动者之一。方励之伙同极少数人，拿一些学生（学生中的歹徒除外）做人质，做政治赌注，制造动乱，煽动暴乱，妄图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你失败了，因为违背人民的意愿，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你溜了，溜到外国大使馆去了。当初学生绝食的时候，你没有绝食；在发生流血事件时，你没有流血，你抛开你的同伙，抛开被你蒙蔽煽动的一些人，躲到外国大使馆去了，你算哪门子的英雄好汉？！一位作家说你方励之是卖国贼，我看说得很准确。我说你是一点勇气、一点骨气都没有的卖国贼。说你没有勇气，因为你溜了，说你没有骨气，因为你溜到外国使馆去了。说得不对吗？方励之。我相信，不仅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对目前形势不理解的人，甚至你的同伙和被你们蒙蔽的一些人，至少在这一点看法上不会有太多分歧吧！

方励之长期以知识分子的代表自居，我也曾经“拜读”过你自1986年以来的一些言论。后来，你越走越远。我和越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也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了你，到现在算彻底地认识了你。你不仅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你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你是一个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颠覆分子，是一个卖国贼。你只能蒙蔽煽动一些青年学生，因为在我周围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就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之前，在日常的言论中，都明确反对你的观点，反对你的所作所为。

在这里，我也想和青年学生讲几句话。因为我也曾是学生出身的人，也曾教过大学生。在 10 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对政府的一些失误和政策也有过意见，例如对教育问题上的失误，对知识分子的分配不公，对“官倒”问题，对物价问题，甚至说细一点，对有贡献、年头也熬到了的中年知识分子的职称问题等等，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法制的轨道来解决，通过真正的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通过别的方法来解决，不能通过颠覆政府的方法来解决。因为国家乱了，那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到头来直接受害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我们知识分子。我是相信一些青年学生有爱国愿望的，但我同时认为你们中的一些人对“爱国”的认识是肤浅的，思想是混乱的。一些青年学生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也不真正了解世界各国以及世界上各种势力的意图和阴谋诡计。随着形势的发展，你们应该认识到，你不想搞打、砸、抢、烧、杀，有人想搞打、砸、抢、烧、杀；你不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少数人就是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是不以青年学生的意志为转移的。极少数人利用改革开放中的失误，利用群众所谓“热点”问题蛊惑人心，制造动乱，以达到

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也就是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的。青年学生们，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对民族对国家的历史责任吧！别被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当作达到他们政治目的工具使用吧！人心是思定的，民心是思定的，请你们在做事的时候要考虑人心、民心。

1989年6月10日

(新华社北京1989年6月12日电)

不

方先生不再“独立”

李 京

方励之先生素来鼓吹知识分子要“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要有“独立的态度”。他为自己设计的也就是这样一种“独立人士”的形象。

如今，他终于放弃了他的所谓“独立”形象，带着老婆，跑到美国大使馆去求人“保护”了。

我们不知道，美国的新闻机构也没有报道，方先生是怎样进入美国大使馆的。或者是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打算逮捕方励之，因而他正常地进入了大使馆。如果是这样，“保护”云云就失去了根据。或者是方先生相当有一点特殊的本领。想当年，孟赏君过关，靠的是鸡鸣狗盗之徒。方先生靠的是什么，未见报道，我们也不好妄加评论。

不过谈到方先生的所谓“独立”，那倒真是“如真包换”的假货。这位先生的倾向从来鲜明得很：凡是中国的一切，都不好，都谴责；凡是美国的一切，都极好，都赞扬。中国的政府，在他看来，40年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当然是糟透了。出路呢？只有从外国“引进一个总理”来。中国的文化，让它“彻底湮没”，也“不需要太介意”，反正可以“全盘西化”。他甚至发出过“中国要解散”的狂言。至于美国呢？无论它在国外怎样用杀人的手段侵犯别国的人权，无论它在国

内怎样用武力和监禁镇压人民，都一概是好极了，是民主的花花世界。这就是方先生的“独立”性。

如果说方先生没有在中国发现一点儿好的东西，那也有点冤枉他。今年年初，他就发现了中国的一个大大的好人。此人名叫魏京生，因为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被判了刑。方先生为了鼓吹对这个宝贝进行“大赦”，他着实花了相当的力气。同时，他也批评过一次美国。那是在今年的2月26日。这一天，他本来是打算去赴美国总统宴会的，颇为洋洋得意。在当天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他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文章，埋怨美国的政治活动家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权问题公开表示关注，“甚至使这个问题成为对外政策问题中的一个首要条件”，但是对中国，“只是嘴上说几句，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一句话，就是埋怨他的主子对中国的内政干涉得还不够。

方先生的这些表演，早就引起了许多正直的中国人的忧虑。今年2月2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就说，“挟外人以自重的行动会带来很多后遗症”。“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干预中国（包括海峡两岸）人权沿袭成风，如果海峡两岸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习惯于投靠美国，邀请美国在他们争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出拳撑腰，则美国的人权干预不但涉及国家主权的遭遇腐蚀，也蕴含了反对派人士受到美国或其它国家的外力控制的危险。”

事实不幸为《联合早报》的文章所言中，方先生已经公开走到外力控制之下去了。他还将怎样走呢？

（载1989年6月12日《北京日报》）

外衣剥光之后

——评方励之教授夫妇“寻求保护”

靳 仁

方励之、李淑娴夫妇近日跑到美国大使馆“寻求保护”。这个简单的事，告诉人们不少道理。

这对教授夫妇“名气”很大。这不是因为作为教授有了不起的成就（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专业水平超过他们的比比皆是），而是靠出政治风头、被人为地捧起来的。这政治风头就是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骂祖国。骂得越起劲、越离奇，就越受到海外反共反华势力的赏识，越受到海内仇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们的拥戴。

方教授有两件外衣：“爱国”与“民主”。他以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姿态，频繁出没于种种“沙龙”、“讲座”、“座谈会”，讲人权，谈民主，说自由，使得天真幼稚又受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还不能一眼识破他的嘴脸。

其实，“爱国”这件外衣，到方励之宣称要作“世界公民”的时候，就已经剥光了。海外有人也对他的大言不惭的表演嗤之以鼻，奉劝他面壁五年。他自然天天忙着骂街和组织、策划、指挥，无暇面壁。前些日子，他又为外国人献计，要他们抽走资金，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那角色有点像个“幕

僚”。现在一溜烟钻进了美国使馆，身份再降，充其量算个乞丐。倘若再献什么计，恐怕只余下“以夷制华”了。

方先生喜欢讲讲自由。他有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共产党也有把他清除出党的自由。他有甘心作洋人黄脸干儿的自由，中国人民也有声讨他的自由。

半年多以前，海外反共报刊就不惜以大量版面，推举方励之为“民主斗士”，说他是即将爆发的大规模“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顺便说说，他们在这领袖行列中，还写有方先生几位亲密战友的大名）。不知道是耳提面命呢，还是嗅到了海内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什么气候，方先生不仅透底拿出诸如“马列主义已经死亡”，“放弃四项基本原则”，“大陆的出路就是资本主义”之类思想的、政治的纲领，供献一柄理解国内报刊某些曲折文字本来含义的钥匙，而且发出诸如“知识分子不能单纯用思想，必须行动”“以邓小平为首的这一代领导人已走到了他们的极限”，“要把希望放在新一代领导人身上”的行动信号。

动乱开始之后，据说他“不怕死地呆着”。“呆着”什么呢？吃饱了饭，说几句“极为壮观”，鼓励学生绝食饿死，以便从死尸堆里摇出自己的将旗。李淑娴则频繁出现于天安门广场，与非法组织“高自联”头头共商大计，指挥学生“一步步把事情推向全国”。

现在好了，一场反革命暴乱已经揭破了方励之、李淑娴的“民主”的本意，“不怕死”的“民主斗士”只剩下舔洋人面包渣的“精神影响”。他们的外衣剥得精光。曾经一度被他们迷惑和欺骗的青年朋友，一切正直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一切善良的、单纯的人们，不妨看一看，想一想。我们从他们的

并不高明的演出中，该悟出点什么东西呢？

(载 1989 年 6 月 13 日《人民日报》)

躲在“洋”伞下的方鼓手

陆诗宣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

这是方励之先生在两年多前那一次学潮开始时用来鼓动学生上街的名言。

对方先生的名言，当时就有些有社会经验的年长学者质疑说：谁也不怕谁，小偷不怕警察，那成什么社会？但是当时方先生还有共产党员的身份，又是一所著名学校的副校长。一些学生在这样的师长教诲下，果然什么也“不怕”了。什么法制，什么纪律，什么民主程序，都不在话下。结果造成的当然只能是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在今年4月，学潮刚开始时，也有些学校中有人引用方先生的这句名言，以“鼓舞士气”。

方先生自然并没有忘记亲自出马擂战鼓。早在今年2月间，方先生就在一系列集会上不断发表演说，声称这样的会再开三次就可以上街了。4月开始的学生上街行动，对于方先生可以说真是如愿以偿。还在4月22日以前（更在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以前），他就对海外记者高兴地声称，再发展下去，就是动乱了。

事实发展到这一步，虽然如了方励之先生的愿，但是对于方先生的“擂战鼓”论却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矛盾：既然“谁

也不怕谁”，又为什么要“擂战鼓”？向谁“战”？又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战”果？为了得到这样的“战”果，需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党、政府、人民、军队对于方先生所“鼓”起来的力量表示害怕，不得不屈服，俯首投降。可是这样一来，“谁也不怕谁”就不存在了。

这一点，方先生心里是很清楚的。他不是一再鼓吹要成立“压力集团”吗？压谁？当然是压党、压政府、压人民，也就是说，要党、政府、人民怕他们，在他们的压力下屈服。他还担心他们的压力不够大，不断地请求洋人，特别是美国人撑腰打气，帮助他们增加压力。

对于方先生说来，可惜的是他错估了自己的对手。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人民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胆小，方先生的鼓声似乎也不那么充分有劲。动乱发展为反革命暴乱，迅速地被粉碎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方鼓手急忙脚底擦油，溜到大“洋”伞底下寻求保护去了。原来他的所谓“不怕”，根据就在有这么一个靠山，所以他才能那么放胆地煽动青年学生去为他做牺牲品。

（载 1989 年 6 月 13 日《北京日报》）

方励之“彻底”到哪里去了？

吉 武

方励之说：“如果要我彻底说，我不赞成爱国主义的口号”。对于“不赞成爱国主义”，他不但“彻底”地说，而且已经“彻底”地干了。现在，他已经“彻底”暴露了真面目，跑到美国大使馆里去了。

从“不爱国”到“卖国”，然后到“卖身”，这就是方励之“彻底”的三部曲。什么“知名学者”，什么“民主斗士”，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言人”，通通都是鬼话。他用自己的行动——投靠美国，把自己仅剩的一点中国入味也“彻底”抛弃了。

不爱社会主义祖国就必然爱资产阶级共和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近代史上，早就有人尝试过。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无一例外的失败了。那些做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迷梦的人，多数都醒悟了；剩下的一些人，都以投靠外国而告终。从“彻底”的不爱国，到“彻底”的资产阶级迷梦，再到“彻底”的卖国、卖身，这是历史的逻辑，也是方励之的现实逻辑。

早在 1986 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恶浪汹涌时，方励之就鼓吹所谓“全盘西化”。它的实质，就是要把中国全盘“化”给西方，全盘“化”给外国，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他叫嚷，“中国目前，更重要的是要引进一个外国总理”，甚至疯狂地鼓吹：“中国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要解体”。方励之的这套主张，真可谓够“彻底”的了。但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并没有因方励之的鼓噪而解体，而是顶住了来自各方面压力，平息了暴乱，祖国巍然屹立。

方励之带着老婆已经钻进美国大使馆。他的卖国行径已“彻底”到卖自己和自己老婆灵魂的地步。是否真的“彻底”了呢？法网恢恢，我们正拭目以待。

(载 1989 年 6 月 16 日《北京日报》)

且看方励之的“独立性”

夏 阳

方励之先生一头钻进美国大使馆“寻求保护”，已成为近日来的热门话题之一。人们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推想着方励之的最终下场。其实，不管事情的最后结局会怎样，方先生的此番举动，已经将自己牢牢地钉在了耻辱柱上。

方先生一向是以“富于独立性的知识分子”自诩的。在他的一些公开演讲中，曾经不厌其烦地谈过他对“独立性”的见解，证明他是个不依附于任何人的人。他最不满意的事情之一，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太强的依附性”，太缺乏像他方先生那样的“独立性”。他号召知识分子，首先是大学生，要“从独立的角度”对社会“干预、介入”。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感觉，也就是独立的意识”。一连串的“独立”，的确气壮如牛，令人“钦佩”。方先生竭力标榜的那个“独立”，究竟是指什么说的呢？用他自己所作的注解，就是要“跟政府讲独立”。前些年当方先生还留在共产党内的时候，就全然不顾党员的身份和党的纪律，站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大谈特谈什么“独立性”，大反特反所谓的“依附性”。这种言行表明，方先生早已将自己从党和人民的阵营中“独立”出去了。他确实很像

是个非常的“独立”的人。

然而，这一次方先生却有些一反常态了。一向标榜“独立”反对“依附”的他，却“卷起”了独立的旗子，一头“依附”到美国人的怀抱里去了。这就使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方先生那样有恃无恐地要“独立”于共产党，是因为他早已死心塌地地“依附”了洋老板，只不过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好意思说明罢了。如今，一场假戏终于收场。方先生的真面目也由他自己的行动揭穿了。他反对“依附”的只不过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至于依附于洋人，他可是从来也没有反对过的。

(载 1989 年 6 月 19 日《北京日报》)

脱下伪装 露出真面

方励之、李淑娴夫妇近日跑到美国大使馆“寻求保护”，彻底脱下了“爱国”、“民主”两件外衣，使人们得以看清他们的本质，懂得了不少道理。

中国知识分子富有爱国主义的精神，也有为人民民主而不懈努力奋斗的光荣传统。方励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以知识分子的“代表”自居，到处讲人权，谈民主，说自由，欺骗和蒙蔽一些善良的人们，特别是一些涉世未深、天真幼稚的青年学生。其实，只要翻阅一下他自 1986 年以来的一系列言论，便不难发现，内中充斥了诸如“马列主义已经死亡”、“放弃四项基本原则”，“大陆的出路就是资本主义”之类的露骨叫嚷。他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实质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就是方励之的真实用心。

诚然，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尚在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是渐进的、逐步发展的，不能一蹴而就。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而绝不是去搞什么资产阶级的三权鼎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中的共识，与方励之所鼓吹的“民主”完全是两回事，出发点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绝对不可混同。一切善良的人们切不能被方励之所鼓

吹的一套所迷惑。如果说，在前一时期方励之还可以利用伪装蒙蔽一些人的话，那么，通过他在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的表演，以至最后跑到美国大使馆去“寻求保护”，其反动面目也就暴露无遗了。他以自己的言行揭开了自己的伪装，人们对他的所作所为，也就看得更清楚了。他原来并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什么“代表”，只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败类。

方励之彻底失败了，更多的人清醒了。中国知识分子清除了自己身上的一小块痼疾，肌体将会更加强壮。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一如既往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更高地举起爱国、民主的旗帜，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积极投身中国的四化建设，努力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载 1989 年 6 月 15 日《光明日报》)

方先生为美国献的什么计

凌 阵

方励之先生终于跑了，跑到美国驻华使馆“避难”，要求保护他的“安全”去了。

人们不禁纳闷，方先生不是一再标榜他“爱国”，是中国的“主导力量”吗？为什么早不跑晚不跑，偏偏在首都刚刚粉碎一起反革命暴乱、国人称快之际，感到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了呢？他的行为告诉了人们些什么呢？

还是一位中国作家一语破的：他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而是十足的卖国。

这样说是否冤枉了我们这位可爱的学者先生了呢？那就让我们看看他近来的一些言行吧。

还是在一个多月前的四月下旬，在一些别有用心分子鼓吹煽动动乱的时候，这位方先生就跑出来通过《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向他所向往之的某国总统暗送秋波、出谋划策。他献计要外国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抽出在中国的投资。为了取得最佳效果：既给予刺激又不致激化到使中国干脆实行完全的自力更生，他又主张这个原则应该“逐步”加以采用。而作为实施的前提，在短期内则要鼓励外国投资，如此等等。

这增加投资之举，目的又何在呢？那位记者先生是这样

记录的：“的确，在短期内鼓励外国投资，以便使中国对外国投资有更大的依赖性。他说：‘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的关系上经济因素越来越重要的时候，那就很容易……’他的这句话没说完。”

请注意：方先生这段话分作两截。前半的要旨在“使中国对外国投资有更大的依赖性”上，后半是说产生了这种依赖性之后，就可以这样那样了。这是方先生故弄玄虚，只说了半句话。

人们不禁纳闷，一向讲话爽爽利利的方先生，为什么此刻竟然如此犯踌躇呢？这不打紧。读者也许还记得两年多以前，他在某学院一次座谈会上，扬言要借开放之机，搞个“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也就是说，要从外国引进“足够的力量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局势”。而这种局势，方先生在答学生问时说，就是要“改变党的颜色”，“应当变颜色，就应当，因为党现在是黑的”。

原来如此！方先生没有说完的后半句话，不过是说，要使中国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外国之后，在政治上也全面受控于外国，以便方先生随意在党内作怪，“改变党”。

方先生的算盘的确打得够如意的了。一方面要外国向中国投资，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倘若你不甘心被人扯了鼻子走，那就要当心人家抽走投资，卡你脖子，让你活不下去。如此这般，不愁你不俯首听命，就范于人；因为局势已经“不可逆转”了。

至此，方先生的用心，可以说是已经明明白白了！

整整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评论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时曾指出，当时的美国政府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少数“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身上的，因为这些人是他们在中国的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岂料四十年后，这层基础又沉渣泛起，跑出来向外国献计献策了——献改变共产党使其变色之计，献颠覆人民共和国使其重新沦为殖民地之策。这些人自以为足智多谋，足可稳操胜券，然而眼下暴乱被粉碎，如意算盘落空，便又不得不露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可怜巴巴地投入洋大人的怀抱。这极富讽刺意味的闹剧，也许是方励之先生所始料未及的吧。

诚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决不会由于几个暴乱分子的一通鼓噪，而有所改变；同时，中国人民也决不会被个别缺乏远见不以合作大局为重的抽资行动而吓倒。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方励之先生的言行，丝毫无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四化的大业，但却无可掩饰地暴露了方先生自己的卖国行径，这才是真真可悲的哩。

(载 1989 年 6 月 15 日《北京日报》)

方励之叛国“三部曲”和“三步走”

乔 云

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之后，一向爱闻“火药味”的方励之，却匆忙带着老婆李淑娴躲进美国驻华使馆寻求所谓“保护”去了。一些善良的群众和学生对此困惑不解：道貌岸然的“方先生”怎么会干出这种无耻勾当？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方励之、李淑娴此举，彻底暴露了他们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惜投靠帝国主义充当卖国贼的丑恶嘴脸。

方励之充当卖国贼，是他思想和行动的必然归宿。早在1986年，方励之就在各种场合狂热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鼓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我们要寻求新的真理”；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诬蔑说：“我们这三十年干的事情，我觉得从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三十年没干多少好事情”，“现在实际上我们也恨透了三十年这种东西”，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是“挂个民族主义招牌，民族旗帜下的封建主义，基本上都是独裁制、集权制”。他否定党的领导，攻击说中国共产党是“封建统治”，咬牙切齿地公开提出要“改

变党”。总而言之，对我国的一切都充满了仇恨。如果说，方励之从“知名学者”、“民主斗士”变成卖国贼，其间经历了“三部曲”，那么，这第一部曲可以名之曰：“仇恨”。

方励之的第二部曲是“亮旗”。他公开声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亮出“全盘西化”之旗，鼓吹、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他之所以亮出这杆破旗，一是为了聚集力量，造舆论，为实现“全盘西化”作思想动员、组织准备；一是为了获得帝国主义的赞赏和支持，找到国际同盟军。这样，以便里应外合，让所谓的西方“先进文化来冲击我们整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所有领域”，也就是从根本上“全盘”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到他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说，“我看东、西方后，认为途径多种多样，不要一讲改变，就想到枪杆子。”他想用“和平演变”的办法使中国改变颜色，深得几十年来帝国主义侵华战略的奥妙，算得上帝国主义豢养的有点文化的走狗。

方励之的第三部曲是“动作”。而“动作”这部曲又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在国内动作。方励之并没有什么理论，也没有什么能耐，但是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有点类似狂犬吠日，什么都敢咬，随时都敢叫，善于挑拨、煽动。近几年来，他一再挑拨知识分子要“觉悟”，要“形成独立的力量”，埋怨一些高校“怎么也没点‘闹事’的迹象”。他鼓动“学生冲击社会”，说“有些东西是外强中干的，它并没有多少力量，你冲了以后他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捅一捅，影响还

是很大的”，“小小地动作动作，全国就非常紧张”。他煽动说，对民主“争取可以有各种方式，……当然也包括一些激烈的方式”。1986年12月4日晚，当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酝酿闹事时，他进一步煽动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在他的挑动下，第二天，中国科技大学和合肥部分高校学生便上街游行。在这次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前夕，在一次集会上，他狂妄地叫嚷，要“对当局采取完全抵制、彻底批判的态度”，煽动说，“这种会连续开三次就要上街了”。他和李淑娴一起操纵王丹搞动乱，煽动学生要“坚持”游行、静坐、示威、绝食，煽动一些人递交什么“请愿书”，借召开亚行会议和戈尔巴乔夫访华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使动乱不断升级，导致发生反革命暴乱。方励之的第二步，是在国际上动作。这几年来，他和李淑娴四处活动，同外国人勾勾搭搭。美国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对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表示“关注”，方励之就心领神会，鼓吹“大赦”给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的刑事犯罪分子魏京生。今年2月26日，他本来打算去赴美国总统宴会，颇为洋洋得意。在当天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他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文章，埋怨美国的政治活动家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权问题公开表示关注，但是对中国，“只是嘴上说几句，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埋怨他的主子对中国的内政干涉得还不够。怎样才算“够”呢？方励之煞费苦心给其外国主子出谋划策。今年4月25日，《亚洲华尔街日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在北京采访方励之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鼓吹抽走资金》。这个“持不同政见者”的称谓是方励之对记者谈话时自诩的。他叫嚣，如果中国在人权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就

应当抽走在中国的投资。并一再声称这“是个原则”，不能退让。他险恶地说，“抽走资金”这个“原则”必须“慎重”实施，应该“逐步”加以采用。如果“大批抽走资金”，中国虽然“经济将崩溃，但是国家将幸存下来”；不如“逐步抽走资金，并选择从一个地方开始：世界银行暂停提供贷款和信贷”，这样，中国既“受到刺激”又不会“垮台”，处在不死不活的境地，任凭方励之及其外国主子牵着鼻子走。他得意忘形地说，要想法使中国对外国投资有更大的“依赖性”，这样，“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的关系上经济因素越来越重要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方励之故意没有把话说完，但其反党反社会主义野心已暴露无遗。

方励之的第三步，也就是他最后要走的叛国投敌的一步，到此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有一次他在香港公开发表谈话时说：“我看中国解散算了”。当时听众问他：“中国解散了，你到哪里去呢？”他回答说：“我到美国去，做世界公民，做中国的爱因斯坦。”那时他已经胸有成竹，准备在适当时机叛国。这次反革命暴乱被平息了，方励之在中国搞“全盘西化”、建立完全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迷梦破产了，他犯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惧怕受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惩罚，只好畏罪潜逃。卖国、叛国是他和李淑娴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的必然发展，是他们这种反动分子的必然归宿。

(载 1989 年 7 月 3 日《北京日报》)

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

方励之、李淑娴，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业经提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逮捕。对李淑娴的批准逮捕并已经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常委会许可。

方励之，男，1936年12月12日生，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身高1.72米左右，体态稍胖，留一边倒长发，方圆脸，戴近视眼镜，走路时挺胸抬头。

李淑娴，女，1935年1月28日生，安徽省嘉山县人，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身高1.60米左右，体态稍瘦，留短烫发，长圆脸，有明显雀斑，走路步伐较快。

方、李二犯畏罪潜逃，现予通缉。请各区、县公安机关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并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协助查缉。发现方、李二犯，立即拘留，并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 1989年6月11日

(载1989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附 录

方励之的反动言论摘录

一、鼓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的确，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所谓发展，就是有的东西要否定，这是事实。马克思主义有很多论断今天看就是错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的问题上，有很多论断是过时的了，甚至是不对的。

(摘自 1985 年 3 月方励之在浙江大学的演讲)

我很主张大学里头要有多样化的思想，多样化的流派。如果我们一切都是单一的、是排他的、狭隘的，必然造成没有创造性。创造性一定是在多样化的、宽容的环境里。我们现在的确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相当一部分势力仍然用这种排他性的、狭隘的东西指手划脚，还打着一个旗号——叫做“马克思主义”。但我们要说，你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你那个起码连杜林还没有达到。杜林是一百年前，你就是一百年后。这种东西我就要彻底揭露他。对这些人，你要说，我就抽你的。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发挥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职责。我们作为知识分子要站出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失去了职责。

(摘自 1985 年 11 月 4 日方励之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这种提法是对的，不应当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的研究，在科学的研究中就是大家探索真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马克思主义也是一家。对我国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更多的涵义就是领导的指导，实质就是政府的指导，或当权者的指导，或者是党的指导。这更不需要。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7 日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高教研究室召集的座谈会上的演讲)

马克思主义能指导自然研究？我觉得没有，也就是说它没有指导地位，在百家研究范围里马克思主义至多只能是一家，没有居于一切之上的指导地位。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8 日方励之在同济大学的演讲)

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宣扬“全盘西化”，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

现在要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重新认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中国式社会主义，这本身是不清楚的。

(摘自 1985 年 3 月方励之在浙江大学的演讲)

原来我们说“社会主义”，现在说“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只有名词。

(摘自 1985 年 11 月 4 日方励之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比如说这次文件（注：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里头，我们可以坦率地说，这个文件有许多好的东西，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有许多地方左家很不满意，我也很不满意。就是把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写上，这是非常不对的。这个概念很不清楚，而且一直是作为棒子用的，但是没有去掉。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5 日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我是欣赏“全盘西化”的观点的，所谓全盘西化，它的含义是什么东西呢？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全盘的、全方位的开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整体来讲。我们整体文化比世界的先进文化要落后，不是在一个方面的落后，而是全面落后了。所以在面临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我们当然应当全方位的开放，不要先在没开放之前，就说你有哪个地方需要坚持，哪个地方是我们的忌讳、不能动的东西。我觉得在没有冲击之前说这话，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8 日方励之在同济大学的演讲)

所谓的社会主义时期，如果平心静气来讲这个时期同样是失败的。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8 日方励之在同济大学的演讲)

中国无论从经济、政治各方面，这三十年做的事情，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8 日方励之在同济大学的演讲)

如果想要上去就是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失败。我们这三十年干的事情，我觉得从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这就是我们改革中面临的形势。我们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至少我对社会主义的意义不是特别的、足够的明确。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这种结果是失败的。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8 日方励之在同济大学的演讲)

大家注意到，在文化对比上争论是全盘西化，还是部分西化；或者说某些东西一定要坚持，不能改变；还是以彻底的心情彻底地改变各方面的东西。我是欣赏“全盘西化”的观

点。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9 日方励之在宁波大学的演讲)

三、公开提出要改变党，否定党的领导

我倒想对这些同学说：要想有志于改革，改变中国目前落后的面貌，改变刚才说的党内那种面貌，入党去更加方便。更容易改变这种面貌。只有靠我们这些人加入进去，才能改变它的面貌。

(摘自 1985 年 3 月方励之在浙江大学的演讲)

我赞成青年入党。有人说对党不满意，那你优秀分子为什么不入党呢？加入就可以改变党的面貌。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5 日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问：三权分立在中国是否有必要和可能？

答：立法、司法、行政这三权分立我想是可能的，这是民主化应当做到的。民主社会是多元制约的，单元的统治必然会造成独裁、专制。当然，三权分立在东方国家实行是不容易的，包括在发达的东方国家。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5 日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我们的建党方针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建党方针是几十年前根据列宁的理论而定的，即首先发展工人阶级，因为农民是落后的。在现在的意义上，如果要建立先进的政党，应该发展谁？所以建党方针应调整，应当是知识分子是最先进的部分，做党的工作首先是要发展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所以知识分子不但是依靠者和被相信者，而是一个推动社会的主导力量。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最好成为党的诤友，这当然是很好的了。但现在已经不只是直陈己见

的时候，而是要求一种独立的地位，而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领导地位。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5 日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实际上监督立法中国都有，中国宪法老实讲，也是三权分立，……当然有一条矛盾就是共产党领导，这一条最后卡在那里。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6 日方励之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改革只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民主上的标准来看这样做是不是促进。至于叫什么东西我认为根本无所谓。叫做社会主义也可以，叫做资本主义也可以。很多东西是没有什么定义的。四个坚持都是没有清楚内涵的。如果说中国不好弄，目前你不要走极端，说四个坚持你把它扔掉，现在很多人甚至会砍你头。你可以说这就是四个坚持。管他呢！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6 日方励之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不光是这样，应当变颜色，就应当，因为党现在是黑的。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6 日方励之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也赞成大家入党，入党以后，我刚才说了至少可以改变党的颜色。我正式提出改变党。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6 日方励之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现在我们培养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封建式的。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水平我真的都不知道。到现在我不理解什么叫社会

主义。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6 日方励之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现在实际上我们也恨透了三十年这种东西，至少我这个经历恨透了三十年西，三十年没干多少好事情。从感情上是这样。但从客观上讲，我们现在是全面落后的状态。中国现在没有一样不落后。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我这个全方位概念，是让先进的文化全面的冲击中国，不是说哪个角度不要冲击。从经济、知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标准，全方位都可以冲击。但你不要先说哪个一定好，你不要先说坚持四条，坚持这个、坚持那个，我觉得没必要。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6 日方励之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四、主张大学摆脱党的领导，鼓吹大学“完全独立”，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政府的关系

从我自己的经历出发，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要去争取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地位和主导的力量，要有这样一种精神。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5 日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我去过的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实行的是封建的，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中国也是这样，挂个民族主义招牌，民族旗帜下的封建主义，基本上都是独裁制、集权制，这样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因素。我们培养的基本上还是封建性质的。封建最大的特点，在于培养要求知识分子依附于统治者。……知识分子所有的价值标准最后是被统治者承认。一篇文章被领导承认就高兴。这是完全错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子不一样，他独立的人生、独立的价值标准，是跟政府讲独立的。从办大学来讲，政府管不着大学，除了政府给大学钱以外，其它你不能管。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6 日方励之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觉得我们国家对知识分子开始起用，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觉悟到自己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一个主导的力量。没有到这一步，还是依附的、封建的。……我就是五十年代的。我觉得他们好的方面是理想主义比较强，但是很差的方面就是驯服工具、非常差，这个驯服工具也是在党、在马列主义一套标志之下的。还是封建的一套，完全一样，就是依附，没有独立人格、缺乏独立。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6 日方励之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过去的口号下，“工具论”模式是非常明显的，要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过去，对整个年轻一代的培养，在人的修养方面，是以雷锋作榜样。他的人品、道德当然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但雷锋的“螺丝钉”观是不对的。如果只是老老实实地当一个螺丝钉，我想至少从现在建设的要求看，不只是螺丝钉，而是各种各样的人都要有，能做大事，也能做小事。雷锋的观念是陈腐的，是“工具论”最典型的体现。“工具论”与十七年的教育口号是连在一起的，完全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7 日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高教研究室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独立精神的涵义，我认为大学至少在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范围中

应该独立于政府和领导。我们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相当的不独立性、工具性，主要是长期封建式的培养，知识分子本身也被异化。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7 日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高教研究室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文明社会里，知识分子越来越占主导作用，应该认识到自己对社会负有的责任，要发表意见，要表示态度。我认为这就是知识分子意识的重要方面，不受任何非科学东西的干扰，要从科学的态度来判断我们的社会。在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往往起着参预与干预的作用，或介入社会，他不是当政的，但是他有独立的作用。这种意见和作用，政府是非常重视的，不但从学术方面，各个方面都是这样，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实际还没有达到这种地位。这种精神首先应在大学生中培养，有了社会责任感，有了知识，就要对社会干预、介入，当然要从独立角度。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7 日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高教研究室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中国，知识分子和知识完全是为统治服务的，是一种隶属状态，科学只是一种工具。自然科学最多是生产力，而不具有独立的含义，由于有了这种依附性，科学本身也就不会有独立的性格，所以老要受到别人的指导。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9 日方励之在宁波大学的演讲)

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有这种自己独立的意识，由于我们自己具有这种知识和对社会的判断力，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不应受到外来的这些非知识的指导和干扰。由于我们长期受封建的影响，由于知识只是经常作为依附的工具，知识

分子也作为依附的工具，所以我们形成的观念就是一种依附。所以，知识分子缺乏这种独立的意识与我们长期的教育有关。十七年时，老强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是个毛，必须附在一个皮上。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9 日方励之在宁波大学的演讲)

五、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煽动学生闹事，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对于这些事情，我曾给学生公开说，主要的要看学生闹事的原因是什么？真正闹起了事校长也管不了；如果闹得没道理，自然不用校长管，也不会闹下去了，我是这种看法。我曾建议科大的学生想一想，这些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学校食堂当然也是需要改进的，但根本问题是物价的问题。我就建议学生应当去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如何去解决。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职责。如果闹事可以解决，也可以闹事。

(摘自 1985 年 3 月方励之在浙江大学的演讲)

我觉得我们科大同学有一个弱点，我和他们很直接了当地说，科大学生不够活跃，你们怎么也没点儿“闹事”的迹象。

(摘自 1985 年 3 月方励之在浙江大学的演讲)

刚才我说中央也非常重视大家的“动作”。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曾找我们座谈。他非常坦白地说，学生不要闹事，如果哪个地方的一个大学闹事了，比如说浙大闹事了，那么浙江省委就别干什么事了，完全围着学生转了。我想这个意思是非常明显，我们学生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摘自 1985 年 3 月方励之在浙江大学的演讲)

有的同学表表这种态，有的同学表表那种态，我想都是可以的。这就是说，一个活跃的社会并不表示它是不安定的；如果是死气沉沉，反而是隐含着什么问题。

(摘自 1985 年 11 月 4 日方励之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中国要往前走，中国知识分子要显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自己已经有的力量，但是没有意识到或是没有敢于显示出来。只要意识到，只要捅一捅，影响还是很大的。大家做为学生对去年下半年以来印象深刻，小小地动作动作，全国就非常非常紧张，对吧？这说明有力量，只是你敢不敢用。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5 日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学生冲击社会，慢慢社会上一些陈腐的观点就会退位。而且老实讲，在些东西是外强中干的，它并没有多少力量，你冲了以后他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这个话可能说得有点狂妄。我们宇宙学占有的真理东西比上世纪恩格斯总结的东西多多了，我们这武器多得多！所以有些东西就貌似强大，我要领导一切，实际上你只要捅一捅它，就觉得它并没有多少东西。这是我十几年的经验。捅的结果是，我一直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科学。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5 日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要改革，成功与否看上面的决心。有人说，现在中国的的确需要引进很多技术，有人说，中国现在最需要引进一个总理。这是开玩笑。是说引进什么都没有用，大概只有靠引进关键地位的才有用。这个笑话的意思表示这个地位在中国非常关键。但是我觉得完全依靠上面的这种决心，中国也不可能真正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只依靠上面本身就不是一种先进的意识。要实现一个民主社会，只有

上面给你民主，我觉得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本身的含义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然后每个人去争取这种权利，然后组成一个社会。上面赐予的东西，不叫民主，那叫宽松，我一开始就不赞成这个词。宽松就是说给你松一松，原来捆得太紧了，直径只有一尺，现在给你松到五尺。但还是有个头在牵着你，直径再大，还是有个圆心在牵着你，这圆心是谁呢？所以这种宽松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民主是我们应当有的权利。要靠我们去争取，才能真正得到。争取可以有各种方式，并不一定要非常激烈，通过舆论与各种渠道，当然也包括一些激烈的方式。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5 日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到底有什么用？我想为社会尽责任，到底这个社会让不让我尽责任？或者说尽了责任以后到底对社会有没有推动？说得更明了一点，就是想对社会尽责任，社会还不要你。我觉得的确是有这个问题，但是不是说一点作用也没有？昨天来这之前，我们有个小小的聚会，有个同志说，现在流行一个顺口溜：“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现在我觉得的确是这样。有些东西，是你不去做，你做了以后发现他也不敢怎么样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民主就是靠一步步争取来的，譬如说批评领导人，就是一个民主的标志之一。现在是谁也不怕谁。我觉得大家可以利用，至少是试探着利用这种权利。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5 日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现在流行一句口头语：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这就回答了刚才这个布鲁诺的问题，这是中国民主的苗

头，我希望中国保持现在谁也不怕谁，扩大这个谁也不怕谁。

(摘自 1986 年 11 月 18 日方励之在同济大学的演讲)